

貴州報道

改革開放貴州報告 歷史篇 之一

池必卿「你走你的陽關道 我過我的獨木橋」

——省報老總編劉學洙追憶三任省委書記(一)



上世紀八十年代是中國改革開放發軔的十年，是在中國共產黨著名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的指引下，我國現代化運動破冰前進的第一個十年。在這歷史轉折期間，筆者作為省報總編輯，有幸親見親歷祖國西南邊遠貧窮落後的省份貴州，在三任中共省委書記領導下，在這場中國大變局中，發生着前所未有的深刻變化。

80年代貴州的改革開放和發展還是初始階段，然而對於親歷那個階段的人，感受殊深，銘記難忘。社會的進步總是漸進的長程。今天是從昨天一路走來的。沒有序幕，就沒有高潮。克羅齊說過：「一切真歷史都是當代史」。鄧拓有詩句雲：「試從舊史悟新聞」。那麼，從80年代開放貴州的歷史記憶中，是否也可以悟出一些有益我們更好前進的「新聞」呢？

這位二把手真是老到

我第一次見到池必卿頗帶戲劇性，給我留下了第一個難忘的印象。那是1978年夏天，他剛從內蒙古調黔接替賈廷三任中共貴州省委第二書記。在一次省委擴大會上，忽有省委統戰部部長惠世如放了一炮，說幹部反映貴州省委「馬力不足」。惠世如是跟首任省委書記蘇振華將軍入黔的老資格，素以耿直敢於說話著稱。當時貴州省委第一書記是馬力。馬力來貴州正值「文革」晚期，帶了幾位他在河北工作時的幹部，擔任一些要職，招來物議。本地幹部圈中流傳了「馬力不足」、「山間鈴響馬幫來」一類的不恭之詞。那天在正式的黨內高層會議上，惠世如公然把話說開了，會場氣氛緊張。會議結束前，馬力在總結講話中，疾言正色指出：作為領導幹部不應當附和下面不負責任、不利團結的議論。馬力講完話後，臉朝池必卿說：你講講吧。當時我在場，心想這位新來書記將如何表態呢。沒料到，池必卿雍容雅雅，「王顧左右而言他」，泛泛地談了幹部理論學習問題，好像剛才什麼事都沒發生。我發現，這位二把手真是老到，有點爐火純青的味道。後來，我與省委副書記王朝文一次下鄉中，閑談時我說：二把手好當。王朝文說：不，二把手的作用很重要，有時常常可以緩衝矛盾，制約第一把手。依我觀察，池必卿大約就是這樣有原則性而老成持重、善於應對複雜問題的人。

靜悄悄的離任

1985年，池必卿67歲那年，他一再要求退下來，建議中央把班子交給比他年輕14歲的朱厚澤。池必卿的開明讓位，是當時全國省委書記中比較突出的一個。1985年5月12日，人民日報一版頭條要聞《貴州省委順利實現新老交替》並配評論《貴在高度的責任感和信任感》，點名表揚池必卿：「原省委第一書記池必卿同志主動退出第一線，滿腔熱情地支持年輕幹部上台挑重擔……受到中央領導同志和貴州省廣大幹部與群眾的讚揚。」

池必卿離任的方式非常獨特，他與朱厚澤一道去重慶開西南經濟協作會，車到重慶，朱收拾行裝請池一道下車，池却笑着說：「你自個去吧，代表省委作個交代嘛。」朱才知道池的車票是直達成都的。他趕朱厚澤下車，自己隨着汽笛長鳴，和夫人、秘書隨列車向成都而去，然後返漢回北京。他最厭惡送行宴請那套官場程序，真是靜悄悄地離任了。

1997年，我寫了一篇《也談貴州現象》的文章，見報後寄了一份給池必卿。池親筆回了一封三頁紙的長信，非常親切，信中談及許多重要問題，說到「貴州同別的地區的差距拉大……其原因只能估計：一是投入不足，二是主觀方面的事實」，信中就這兩方面作了有見地的分析。信的末尾連呼三句萬歲：

「落後的地方經濟趕一趕萬歲！」
「質量第一的條件下，把速度提高一點，但絕不要虛報浮誇，扎扎實實工作萬歲！」
「因循守舊要不得，得過且過要不得，自我陶醉更不好，謙虛萬歲！」

最後交代我：「這封信你閱後，立即焚毀，不要向外傳。」
幸好我未遵從老書記之命，至今原信保存完好。貴州是池必卿政治生涯的最後一站，然而却是他綻放人生燦爛風采的舞台。他在貴州七年的實踐，在貴州現代史和中國上世紀80年代農村改革史上，留下了精彩一頁。



搞錯了，我負責！

1979年10月，原貴州省委第一書記馬力因患癌症留京治療，中央任命池必卿代理第一書記。繼後，馬力病逝。1980年6月，中央任命池必卿為第一書記。這段期間，中國正進入以農村改革為突破口，推動改革開放進程的重要關頭。領導貴州變革的使命便歷史地落在池必卿的肩上。
熟悉中國農村改革故事的人都知道，1980年9月間，池必卿在黨中央會議上發出一句經典名言：「你走你的陽關道，我過我的獨木橋」，那是針對當時黑龍江省委書記不贊成搞農業生產責任制提出的。池說：我們來個「君子協議」，各走各的路，互不干涉，好不好？後來胡績偉來貴州考察時，繪聲繪色地向我介紹當年中央會上的動人情景，胡老說：「你們池書記那種激情，讓我非常感動！」

事過境遷話當年，對生活在今天開放時代裡的年輕讀者，也許很覺隔膜。然而，過來人知道，30年前邁開這一步，真不容易。記得在上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一方面農民在方興未艾的思想解放大潮澎湃下，從下而上、自發地起來突破那有如玄冰之凍的「一大二公」不可觸犯的禁區，悄悄地進行改革探索；另一方面層層權力場有些同志，却是那麼憂心忡忡，生怕實際生活不依既定的金科玉律前行，於是圍追堵截，這也不準，那也不行。池必卿形容當年我們的領導面對群眾的創造是：



1984年11月28日，池必卿在《貴州日報》創刊35周年紀念會上講話。從左至右為：朱厚澤、池必卿、劉學洙、王朝文。

「敬酒不吃吃罰酒」，成為農民衝開改革大門縫的「抵門杠」。池必卿支持農民出身的苗族省長王朝文（時為副省長）的提議，先把春耕生產搞上去，由王朝文在全省電話會上宣佈，對農村自發的種種「包產」、「包幹」形式，採取「承認現狀，停止糾偏」的方針。池必卿尖銳地說，農民用「罷耕」對付我們，我們不能再與廣大農民頂牛，農民有權按自己的方式先搞飯吃！

那次「承認現狀，停止糾偏」簡單8個字，是有轉折意義的。王朝文親筆寫了一份回憶錄——《省委是怎樣下決心允許包幹到戶的》，文章中寫道：

「大約是1980年3月12日，我向池必卿單獨匯報農村調查情況……當即決定當晚8時開書記會研究。這個會議比較神秘，不讓秘書到會作記錄。池必卿同志主持，由我匯報，講了以後就討論。吳實說，我當紅軍出生入死，是要為人民服務，給老百姓做事的。從土改到農業合作化，想要解決老百姓的吃飯問題，讓老百姓富起來。但搞來搞去，到現在也富不起來，連吃飯都解決不了。我看包產到戶就包產到戶，現在去糾正也不好糾，糾了以後他們還要搞。徐健生說，搞來搞去飯都沒得吃的。我們這些人是「抵門杠」。上頭不叫搞，我們跟着不叫搞，老百姓要搞，我們在中間成了抵門杠。我現在不再當抵門杠了。池必卿同志說，我支持。我知道在黨內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但在貴州這樣的地方，我同意搞包產到戶，具體就看怎麼搞法。這個時候有位同志說，我建議請示一下，中央同意以後再搞。池必卿同志說，要請示哪個批准？哪個同意你搞？要幹就不要匯報，如果要匯報，我看也沒有人批准你搞。我們省委幹，我們省委承擔責任。搞錯了，我負責。最後書記們同意池必卿同志的看法，都說，不要匯報了，我們自己搞，責任自負，敢作敢當。」

我認為，這段生動細節是應當載入史冊的。有時決定歷史進程的大事，往往就懸於當事人的一次小會的擔當與良知，甚至可以說是一種回歸常識。那位建議先請示中央再搞的領導同志，缺乏的就是敢於擔當以及回歸老百姓常識來決定自己執政取向的勇氣。

包幹到戶終於獲得了「准生證」

那次「停止糾偏」電話會後，省委領導便分頭下鄉調查。池必卿去黔東南，他不帶官員，只帶幾個身邊秘書幕僚人員，貴州日報社派我參加。池非常深入，跑了黔東南七個縣二十個鄉村，直插到最基層。他住公社辦公室即鄉公所的簡陋木板房，隨行人員常住農家。一路不準事先通知縣領導，不準迎送，杜絕宴請。有一次我們來到黎平縣尚重公社，一時找不到當地幹部，就在鄉場一家小飯店，大家坐在小板凳上，圍着一張矮圓桌吃飯，蒼蠅飛來飛去，池必卿談笑自若。

重要的不僅是作風深入，更重要是思想開放。池必卿一路上體察農民和基層幹部的真實想法，研究各種責任制形式，歷史起伏原因，可能產生的利弊，他的態度明朗了。整整一個多月，我記下了兩個本子的調研第一手材料，這也許是80年代省一級最高領導進行農村改革問題調查難得的原湯原汁記錄。那次下鄉一個月，池必卿沒有讓我寫一個字的新聞報道。我深深為他那種敢於實事求是的精神所感動。

5月中旬，下鄉的省委常委們都回到貴陽，池必卿主持召開了九個半天的常委會。為什麼要開這麼多天呢？因為好讓大家敞開思想，贊成的反對

的意見都充分擺出來，半天開會，半天處理日常工作。這次常委會達成共識，決定放寬農業政策。並決定會後起草一個正式文件。7月15日，池必卿審定簽發了《中共貴州省委關於放寬農業政策的指示》，文件明確規定，生產隊可以包產到戶，也允許包幹到戶。

這裡需要交代一點全國的背景：其一，在1980年，全國尚沒有任何省一級黨委，以正式文件形式作出類似官方決定。有些省也支持，也允許，或默認，但沒有形成省委正式的紅頭文件。其二，1980年12月，省委在向中央上報《關於建立農業生產責任制情況的報告》中，首次將包幹到戶定性為「社會主義的一種生產責任制形式」。當時胡耀邦同志在報告上批示：「應當同意他們的看法和做法」。所以，當年貴州幹部都高興地說，包幹到戶終於獲得了「准生證」，上了合法「戶口」了。到了1982年，中央一號文件才正式定性包幹到戶是「社會主義農業經濟的組成部分」，其中當然包含了貴州農村改革的實踐經驗和理性認識。

這說明，池必卿不是不請示中央，而是獨立思考，獨立負責，以貴州的試驗與經驗為中央決策作出一份貢獻，最終得到中央的肯定。

三年內不講「形勢大好」



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右)視察六盤水市時，聽取省委書記池必卿(中)的匯報。

1988年，池必卿離開貴州多年，接受《貴州日報》記者晉京為紀念三中全會十周年專訪，他在訪談錄中親筆寫了如下一段話：「農村的包產到組和包幹到戶，是農民反對大鍋飯以治窮治懶的創舉，任何人都不應當把群眾的創造記在個人賬上。首先在一個範圍內推進農民這一創舉的不是貴州，我們只能說由於貴州當時特定條件，加上幾位中央領導同志的建議，我們才較早地取得了全黨認識上的一致，才能在1980年普遍地推行到全省。這樣講比較符合實際。」

這段文字，措詞十分準確精當。「在一定範圍內」推進農民創舉的，首先確實不是貴州。但「普遍地推行到全省」，貴州却是最早，或最早省分之一。其中說的「中央領導同志」是指鄧小平說過包產到戶沒有什麼危險。

農村改革第一步的成功，使貴州在那幾年贏得了主動。包幹到戶後，農業經濟經受了兩次嚴重的考驗，一次是1981年大旱災，一次是1982年烤烟等主要經濟作物大幅度限產（全國宏觀調控），而全省糧食及農業總產值却連年增長。到了1983年底，池必卿提出：「在財政經濟開始擺脫困境的新情況下，全省要有計劃地開發資源，發展經濟」。他同時又保持清醒頭腦，多次說包幹到戶之後，我們沒有得心應手之作。這方面，我親身體會到池的低調，不容任何過熱的宣傳。1984年1月3日，《貴州日報》頭版發了一條要聞《我省財政經濟去年爬上一級新台階》，當晚他讓秘書給我打來電話嚴肅批評。後才探知，因為那幾天胡耀邦總書記和中央一些負責人在貴州召集西南幾個省市研討開發西南的戰略問題，池希望多讓中央人了解貴州的困難，而不是自吹我們的成績。後來他告訴我，「有十分成績講七分、八分就行了，不要講滿，更不要講過了。講過了，人家會說是吹牛的。全黨工作估計應當這樣，報紙工作估計也應當這樣。」這是池必卿的一貫思想作風。記得他剛代理第一書記的時候，有一次全省地縣委書記會，他以濃厚的山西口音，很帶感情地說：我們要咬緊牙關，三年內不講「形勢大好」這樣的話。作為報人，我不知參加過多少黨委開的大小會議，像池必卿這樣，坦率、劉切地要求幹部不要奢談形勢大好的領導人，在我記憶中可能絕無僅有。唱高調容易，唱低調不易。池必卿的低調，恰恰說明他的底氣很足。

（作者簡介：劉學洙，1929年生，高級編輯，貴州日報社原總編輯、社長，有《貴州開發史話》、《凝望山之脊》、《人物筆記：舊月輝輝》等10餘種文史著作出版。）



池必卿與夫人20世紀50年代末在北京香山合影。